

创作谈

以梦为马

□ 何 闯

2014年国庆假期,我兴奋地跑去电影院看一部名为《十二生肖之城市英雄》的动画大电影,一口气跑了几家影院,都没有排片。原来,在竞争激烈的国庆档,我编制的这部动画电影未能抢到理想排片,最终的票房成绩也不理想。

这让我有点失落,因为我告知了所有亲友。而当时让我更加难为情的是,除了这部动画大电影,此前我还参与编制了两部电视剧,一部成了央视八套的开年大戏,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等多项殊荣,一部成为年度现象级的爆款,家喻户晓。然而,影视是集体的艺术,需要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链条支撑,并非所有参与创作者都能留下姓名。这两部作品,我便无缘署名。

开启编剧人生时,我还是个锅炉工人。每天干完活,就抱着笔记本电脑躲到无人的角落,以梦为马,奋笔疾书。平衡工作与创作,十分辛苦,但不感觉心累,我的眼里充满着光,时刻准备着把现实中捕获的物事与人事,用文字赋予它们在文学空间的别样生命姿态。

相对文学,影视是个新潮的玩意,不过百年历史,影视编剧自然也是个较新的行当。那影视编剧,需不需要拓深文化底蕴?年少我与当下的我,对此意见相左。

我文学基础不好,初中时突然梦想当作家,并偏执地认为学校培养不出作家,于是自学,偷偷写作。有天上课时纵笔挥毫,竟有些得意忘形,十几万字的小说被老师当场收缴,同学们也是一顿嬉笑。课后,我流泪走出校门,一边回头指着教学大楼,一边大声吟出李白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当初的年少轻狂,让我的创作渐渐变得艰难。看着那些编剧中的佼佼者,都是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对生活有着敏锐感知的人。于是,我经常请假去各地名校,偷偷溜进一些名师的教室蹭课。有次听课如痴如醉,还忘形地站起来回答问题,遭到老师打开学生名册问我学号和姓名,我才尴尬地夺门而逃。那时,走出校门,我又想起李白的诗,只是此刻的内心却充满温暖。

无疑,在大量爆款成功案例的驱动下,许多制作单位、资本运营者将影视当成了产业风口。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影视的受众面、影响力远超过其他,成为无限接近大众的一种文艺样式。市场越大,责任越大。在通往影视创作的道路上,编剧如何让作品既获得市场的青睐,又取得良好的口碑?艺无止境,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开放话题,而我也始终在探索这个谜题的解答。年少不同,对待事物的看法不同,偏好的技巧也有所区别。但从始至终,我都对创作保有一份纯粹的冲动与热爱,这许是梦想,也是我的人生。

2003年,我母亲癌症晚期,高额的治疗费让家里过得不再宽裕。不久有位书商朋友约我写一本玄幻小说,相比微薄的稿费,出一本书多少能让母亲为儿子感到一丝荣耀吧。后来历经波折,我的小说出版了,但此时的母亲已经在另一个世界。怀着对母亲的怀念,我重拾了那个一度曾想过放弃的写作梦,直至今日。

多年前,我独立编制的40集动画片《十二生肖之天下属兔》在央视少儿频道播出,并获得广电总局2011年度优秀国产动画片三等奖、安徽省第12届“五个一工程”奖。2018年,我联合署名编制了玄幻大剧《武动乾坤》在东方卫视和优酷同步播出,网络播放量超60亿……起点很低,意味着任何失败都是理所当然,而前方还有无限的进步空间。在我编制的作品中,有些是网文改编。原著与改编作品,既联系又独立,皆需要独创性。因为二者表现形式不同,小说那样写好看,但是要用画面具象化就未必好看,如小说的故事情节大多是单线发展,一些人物形象不够丰满,人物关系设定不够有戏剧性等,这些都需要调整。《武动乾坤》便是一部热门玄幻小说,小说中主人公武功升级的故事对读者而言是热血的嗨点,但是从影视剧的角度看,不具有戏剧性,所以改编时就要编戏,让小说中的那种热血具象化、戏剧化。

近几年因为疫情等因素,影视行业受到了冲击,个人的创作也起起伏伏,好在时光并未蹉跎,蛰伏也是一种历练。初中毕业时,有同学在毕业留言册上劝我别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要步入人生的正轨。其实,那时我也觉得自己是痴人说梦,但是已经坚定地想好:“我以梦为马,不求未来花团锦簇,但内心始终要暗藏百万雄兵。”

第182期

本版邮箱:perft@qq.com
本版电话:0791-86849413



观众在,电影就在

□ 凌 瀚

“过去十年,中国电影在文化自信、艺术自觉、产业自强的驱动下,创造了中国电影的一个黄金时代。”第35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会长陆绍阳如是说。

诚哉斯言。过去的十年,我国电影院银幕总数突破8万块,年均生产故事影片达到700余部。我们经历了2014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较2005年十年间翻18倍的欣喜;经历了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全球影业陷入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成绩首次超越北美成为全球“第一票仓”的振奋。当然,深入关切影视行业,我们会发现中国电影仍然面临巨大挑战: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特别是2022年作为疫情发生后的第三年,困难叠加,行业呈现出市场不稳定、片源不确定、头部企业效益持续下降、影片投融资热情减退等连锁反应。

怎么看待中国电影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中国电影的发展路径应该是怎样的?不久前,笔者在庐山就这些问题与业界人士进行了对话——

优质内容生产是电影产业化的核心

中国电影市场的转型,并非疫情之下出现的“季节性”现象,实际上更早几年,头部城市银幕饱和、电影市场下沉等话题就成为业内讨论的重点。

最让大家关注的是影片供给的问题。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群飞说:“今年电影开机数和立项备案数量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都在下降。”这让一些人忧心忡忡。内容生产是电影产业的核心,没有优质的内容输出,整个行业无异于无米之炊。

但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数量的减少正倒逼行业转向“内容为王,精品创作”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在行业最火热的几年里,产业链上游的巨头们将经营重心放在争夺大IP、打造明星光环及流量变现上,这些“捷径”让一些资本尝到了甜头,于是蜂拥而入,但它带来的后果是,很多人失去了打磨精品的志向和雕琢内容的耐心。“那一段时间,影视行业已经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维持一种平稳健康的状态了。”在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会长张思涛看来,电

影创作要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从长远来看,推动行业去芜存菁,恢复理性是必要之举。

从第35届金鸡百花电影节“金鸡电影论坛·学术峰会”发布的《中国电影十年艺术发展报告》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电影界对整体创作质量和制作质量有了更高的追求,对优质内容的生产更加关切。

互联网观影趋势渐明

尽管中国电影市场正在经历转型,但市场反馈让电影人看到了希望:据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在全国停业影院数量达到3223家、停播银幕将近1万块的情况下,2022年暑期档(6月1日至8月31日)总票房达91.35亿元,总观影人次为2.34亿,分别较去年同期上涨23.8%、15%。票房与观影人次的双增,显现出电影市场的活力——电影市场的基本面还在,存量观众和存量市场依然可观。更重要的是,观众还在,人们的观影消费需求依然迫切。

在稳中向好的形势下,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侯光明注意到,中国观众平均观影年龄正在升高,“2012年,我国院线平均观影年龄是21.2岁,但到了2021年,院线平均观影年龄已经超过28岁。”年轻观众去哪了?

作为电影的放映终端,电影院从诞生之初,就因其内容传播和社交两大功能吸引着年轻人。然而,进入信息时代,放映终端变得丰富多元,不论是获取内容,还是社交,电影院都面临着技术更迭带来的新对手——网络平台的挑战。此后,一大批“既具有坚实的主流价值观,又具有商业电影的娱乐性和艺术性,在市场层面也获得主流地位”的电影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成为近年来中国电影发展中一道亮丽的景观,业界称之为“新主流电影”。2017年,《战狼2》收获56.8亿元票房。此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长津湖》以及《万里归途》分别以骄人的成绩成为从2019年到2022年4年间的国庆档票房冠军。一大批高品质的新主流电影甚至催生了一种新的“国庆节俗”——国庆长假,呼朋唤友或是拖家带口到影院去感动一次,热血一次,接受一次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教育成为一种新的节日消费时尚。

在新主流电影类型中,既有重现伟大革命历史事件和进程的宏大叙事,也有以集锦片模式讲述的小人物故事。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把当下的新主流电影分

为三个类型:一是以《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战狼》《长津湖》《狙击手》等为代表的战争动作片;第二类是以《中国机长》《中国医生》《流浪地球》为代表的灾难片;而第三类是献礼片,如《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1921》等。这尽管是学者的一家之言,但是作为观众,笔者也以为新主流电影类型应该更加多元、题材应该更加丰富。新主流电影应该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大的作为。

在庐山国际爱情电影周上,笔者就新主流电影未来的发展请教了《东京审判》《你是我的春天》的导演张弛。张弛认为,新主流电影要有更大的发展,首先要创作者打破创作上的桎梏,而这种桎梏更多的是来源于认知层面,“在题材、类型的选择、人物塑造、叙事的视角及手段等方面应当更加包容、多元,要做更多的探索,要百花齐放。”

在坚守主流价值的同时,不断接纳其他类型片的元素和叙事方法,用“接地气”的视角和讲述,用饱满的情感故事去探讨人生、思考社会,或许是新主流电影有待进一步开掘的富矿。

一段时间,一些影视作品沉浸在过度的“美化”当中。演员要“磨皮”,场景要“唯美”,结局要“合家欢”,甚至连现实题材作品也变成“海市蜃楼”,充斥着许多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的乌托邦式的桥段。这些作品缺乏对现实社会和普通群体的观察与思考,缺乏“接地气”的生活呈现和情感表达,被观众所诟病。上半年,央视8套播出了聚焦生育焦虑的电视剧《亲爱的小孩》,面对质疑,央视力挺:“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的镜像和提炼,创作意在真实、真诚,更应勇于打破‘滤镜’,直面现实症候,予以温情关切。对于现实题材影片来说,洞察症结不等于贩卖焦虑,温情治愈并不意味着凭空造梦。”

现实生活,有奋斗与快乐,也有挫折与悲伤,有温暖也有残酷,这些都需要被看到。可喜的是,我国新主流电影或曰新主流电影正在不断创新,《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万里归途》等以百姓视角体现宏大主题,亲切而平实;《我不是药神》《亲爱的》等以强烈的现实关照,给人以温暖的抚慰……我们坚信,未来我们会看到新主流电影的更多姿态。

(压题图为电影《金剛川》剧照,电影《万里归途》海报)

新主流电影应当有更大作为

自20世纪80年代“主旋律”这个概念被引入电影,业界就约定俗成地将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历史重大题材影片与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真善美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定义为主旋律电影。那段时间,《开国大典》《巍巍昆仑》《周恩来》《开天辟地》等一大批优秀的主旋律电影相继出现在银幕上。

新世纪以来,随着电影全面产业化改革,中国电影人开始在主旋律与商业属性之间寻找结合点。2006年《云水谣》开始了主旋律电影的新探索——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将革命与爱情巧妙结合,并进行类型化的转型。此后,一大批“既具有坚实的主流价值观,又具有商业电影的娱乐性和艺术性,在市场层面也获得主流地位”的电影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成为近年来中国电影发展中一道亮丽的景观,业界称之为“新主流电影”。2017年,《战狼2》收获56.8亿元票房。此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长津湖》以及《万里归途》分别以骄人的成绩成为从2019年到2022年4年间的国庆档票房冠军。一大批高品质的新主流电影甚至催生了一种新的“国庆节俗”——国庆长假,呼朋唤友或是拖家带口到影院去感动一次,热血一次,接受一次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教育成为一种新的节日消费时尚。

在新主流电影类型中,既有重现伟大革命历史事件和进程的宏大叙事,也有以集锦片模式讲述的小人物故事。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把当下的新主流电影分

为三个类型:一是以《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战狼》《长津湖》《狙击手》等为代表的战争动作片;第二类是以《中国机长》《中国医生》《流浪地球》为代表的灾难片;而第三类是献礼片,如《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1921》等。这尽管是学者的一家之言,但是作为观众,笔者也以为新主流电影类型应该更加多元、题材应该更加丰富。新主流电影应该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大的作为。

在庐山国际爱情电影周上,笔者就新主流电影未来的发展请教了《东京审判》《你是我的春天》的导演张弛。张弛认为,新主流电影要有更大的发展,首先要创作者打破创作上的桎梏,而这种桎梏更多的是来源于认知层面,“在题材、类型的选择、人物塑造、叙事的视角及手段等方面应当更加包容、多元,要做更多的探索,要百花齐放。”



舞台艺术

吉安采茶戏在叙写红色故事、颂扬英雄人物方面有着优良传统,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吉安采茶戏就创作了《大放马》《送哥哥上前方》《志愿当红军》等优秀的红色戏剧,宣传革命,受到百姓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吉安采茶戏更加自觉地把传承红色基因、叙写英雄故事作为主要创作方向,出品了《父子》《雪原枪声》《漫漫风雨路》《热血山哈》等优秀作品。今年在玉茗花戏剧节上演的《杜鹃花又开》是《杜鹃花开的地方》的姊妹篇,它们同是井冈山革命题材,杜鹃花成为两部剧中富有重要寓意的艺术符号。吉安采茶戏的艺术工作者试图把“杜鹃花”系列打造成红色戏剧的精品力作,不断地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

一个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革命者,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对待自己的故友、亲人与普通群众?当一个母亲遇到失散多年的儿子,该如何弥补亏欠的母爱?《杜鹃花又开》以老一辈革命家曾志为原型,从她在革命成功后对待战友与亲人的态度中,体现革命者的英雄本色。

杜鹃灼灼映初心

□ 周子强

剧中方昭,是原井冈山根据地小井医院党支部书记,当年敌人的一次突袭,小井医院130名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全部遇难。唯一幸免于难的方昭一辈子终生生活在对战友的怀念与愧疚中。遭袭之后,部队要转移,方昭刚出生的孩子尚未满月,她把孩子托付给当地的老乡,然后义无反顾地跟随部队继续革命。革命成功后,方昭已成为地方的领导人,母子相认,这时儿子张红来提出要留在井冈山,为养母养老送终。方昭心有不忍,但她内心深处希望儿子能守在井冈山,为那片红土地、那里的乡亲做出贡献。在她八十高龄的时候,她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井冈山,见到了久别的乡亲与亲人。孙子孙女们面对身居高位的奶奶,鼓足勇气提出了一个不算太高的要求:把他(她)们的户口转为商品粮,方昭断然拒绝了。这个不算太高的要求,这时她的孙子孙女提出了一个问题:

“您为何如此‘绝情’?”
面对孙子孙女的疑问,方昭用心作了回答——这里,有许多牺牲战友的儿孙,有许多贫困农民的儿孙,有千千万万的普通群众的子女,他们辛勤地在这里劳作,没人替

他们走门路离开土地吃商品粮。如果她的孙辈利用公权,这对牺牲的战友不公平,这对井冈山乡亲不公平,也是对人民的不公平。

方昭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杜鹃花又开》把一个革命家的高尚纯洁铺陈于舞台上。

红色题材的创作,容易落入情感苍白的窠臼,而《杜鹃花又开》站在人民的立场,用真情实感感染着观众。创作过程中,无论是编创者,还是演员,满怀崇敬之情,全身心地投入,每次排练与演出,都有庄重神圣的仪式感,而这种崇敬化成了美学上的崇高,传递给观众。

吉安采茶戏孕育发展自民间,旧称“花鼓戏”“三角班”。吉安采茶戏把叙写劳动人民的劳动场景作为主要内容,以劳动人民的情感为主基调。《杜鹃花又开》传承和弘扬了吉安采茶戏的地方特色,作为吉安采茶戏音乐的主要腔调之一,《慢川调》在剧中被大量运用,如表现方昭与儿子离别、张红来与养母悲苦生活等场景中,《慢川调》深情悲苦的表现特色运用得恰到好处;当方昭得知失散多

年的儿子的消息后,心中百感交集,唱起了杂腔小调《十月怀胎》。这些本土化的艺术创造,深深植根于群众文化,符合人们的审美,从而引起大家的共鸣。

剧中还不断穿插吉安采茶戏的标志性动作程式——矮子步、单袖筒、扇子舞,这些动作程式配以生活化的表演,填平了艺术与生活的鸿沟,观众可以从中看到地方戏曲艺术的生动活泼,可以看到劳动人民的朴实善良,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吉安采茶戏《杜鹃花又开》剧照